

大学国学读本

国学之光

近代国学大家论著选读

冷成金 沈广斌 编著

JINDAIGUOXUEDAJIALUNZHUXUANDU

本书选择了王国维、熊十力、梁漱溟、顾颉刚、冯友兰、唐君毅、梁启超、牟宗三等八位国学大家，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其生平著述以及主要学术贡献，每位大家的简介后面都附有各自的代表性论著，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方便。

大 学 国 学 读 本

JINDAIGUOXUEDAJIALUNZHUXUANDU

本书选择了王国维、熊十力、梁漱溟、顾颉刚、冯友兰、唐君毅、梁启超、牟宗三等八位国学大家，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其生平著述以及主要学术贡献，每位大家的简介后面都附有自己的代表性论著，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方便。

国学之光

国学大家论著选读

冷成金 沈广斌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学之光：近代国学大家论著选读/冷成金，沈广斌编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大学国学读本)

ISBN 978-7-300-09134-1

I. 国…

II. ①冷…②沈…

III. 国学-中国-文集

IV. Z1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7877 号

大学国学读本

国学之光：近代国学大家论著选读

冷成金 沈广斌 编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印 张 25.25 插页 2

字 数 371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从 20 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随着读经、祭祀等各种社会形式的“国学热”的兴起以及高校国学研究机构的设立，国学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沉寂后，再度成为了学界乃至公众媒体热议的“显学”。我们在谈论国学、推广国学的同时，禁不住要问一问，到底什么是国学呢？

沿着历史的年轮向上追溯，我们发现“国学”一词，在中国古代早就存在。它最初指的是相对于乡学而言的国家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学校，以六艺为具体的教授内容，后演化成为最高学府的代称。这就是国学的最初意义，这种意义一直沿用到了清末。鸦片战争失败后，国人抛弃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幻想，开始从制度、文化上来追问落后的根本原因，“西学东渐”和“中体西用”作为民族振兴之策被提出来。这些巨变使知识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感，并成为提倡国学的内在动因。

在清末民初这种独特的历史与时代背景下，“国学”一词的含义发生了转化，近代意义上的“国学”顺理成章地被提了出来。贤达之士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并积极创办刊物，创立组织来宣传国学宏旨，国学一度在民间和官方都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关注，国学的固有价值也得到了有识之士的重估。如章太炎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提倡“以国粹激动种性”。他还出版了《国学概论》（1922 年）一书，此书可以说是国学专著之始。1911 年，罗振玉、王国维创办《国学丛刊》。1919 年北京大学创办《国故月刊》，刘师培在《发刊词》中表明了“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宗旨，后又撰写了《国学发微》，“国学”遂成为

国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通称。1923年，胡适等创办《国学季刊》杂志，提出“整理国故”。“国学”在这种情形下转化为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而在不同人的使用中，它又包含着国故、国粹、国学的三重内容。三者在内容上各有侧重，但又有着共同的指向，在使用中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国学虽然作为民族振兴的文化策略被提出来，但实际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分类问题仍然存在，并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国学到底是超于学科之上的总名，还是可以以现代学术标准划分的具体的传统的中国学术？国学是无所不包的全体，还是一无所有的空名？清末民初的那场论争并没有得出令所有人都信服的结论，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论争使我们对国学是什么有了更多更深刻的认识，对于国学的重振、传统的弘扬仍然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国学由旧学、国故学走向新国学，国学的未来路向也得以昭示出来。

回顾历史，梳理先前的国学观念，我们发现关于国学是什么可谓众说纷纭，总体来看，关于国学的定义大致分成以下几种：传统学术的主流是经学，所以国学即经学（蒙文通）；国学就是国故学，指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与文化（胡适）；国学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顾颉刚）；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是一个民族固有的学术和文化（章太炎）；国学是一国所有之学（邓实）；国学即“中学”；国学是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辞章之学。在这几种观点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以下观点：国学是指以经史子集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是指以释道儒三家学问为主干，以文学、戏剧、音乐、武术、民俗等为枝叶的传统中国文化体系；国学分为狭义上的国学和广义上的国学，狭义上的国学就是指经史子集，而广义上的国学则包括民国以前中国所有的学术与文化之总和。

值得指出的是，有的学者将国学进行了细分，大致理出了物质、技术、制度、精神四个层面；也有的学者认为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术，从学科上可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等，从思想上可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等，从典籍上可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尤其以经部为主。总而言之，有些学者主张把“国学”界定在传

统思想、学术范围内；而更多的学者则倾向于“大国学”，赞同将本国的一切历史、文化、学术现象等全部囊括在内。

其实，国学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对它的认识是随着不同的历史情景而变化的。对于国学定义的分歧，反映出的是国学的丰富性、开放性和国学的内在的生机。无论怎样定义国学，我们要做的，都不是对国学的全盘继承或复制，而是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下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而前人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此，我们选择了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王国维、顾颉刚共八位国学大家，予以简介。我们的选择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是因为儒学是国学的主体，所以文中更多地考虑了新儒家在国学中的地位与影响；二是侧重传统学术及其相关的争鸣。在简介完每位大家之后，都附有该大家的代表论著的选录，方便读者阅读，以利于读者获取对国学的直观感性的认识。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选择并不是全面的，更不否定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因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心中国学大家的标准是不同的。

这是一个国学需要昌明的时代，国学再度升温，不仅有着现实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更为根本的是它显示出国人对文化自觉、文化认同感的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种认同感增强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有幸生于这种时代，希望通过国人的共同倡导，普及国学知识，增加读者对国学与传统文化精神的了解，使传统文化与学术的薪火相传，并祈盼减少“国学热”的急功近利的色彩，使之按照自己的规律对现实和未来发挥作用。

我们相信，国学会迎来真正属于自己的春天。

目 录

梁启超：未能忘情是政治	1
熊十力：特立独行的哲学家	42
梁漱溟：在问题中生活的“最后的儒家”	94
冯友兰及其新理学	145
牟宗三：“良知坎陷”与道德形上学的重建	189
唐君毅：人文世界的“灵根自植”	251
王国维：在现代学术与文化传统的磨啮中	297
顾颉刚与“古史辨”	345

梁启超：

未能忘情是政治

一、生平及著作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戊戌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自幼接受传统教育，被誉为“神童”。1889年，17岁的梁启超参加乡试并考中举人，次年进京会试，未中。在回粤途经上海时，结识了康有为，拜入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康有为在广州创办的万木草堂。在康氏思想的影响之下走上了维新之路，于是有了后来的“康梁”之称。1895年再度入京参加会试。携手康有为，与在京应试举人联名发起了“公车上书”，震动全国。他先后主笔《中外纪闻》和《时务报》两大刊物，在《时务报》上发表了题名为《变法通议》的一系列文章，以政论宣传变法。1898年，维新运动开始后，他受到光绪召见，受命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创办《清议报》，宣传维新并与革命派初步接触。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并以此为阵地，与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展开论战，坚持君主立宪的改良道路，影响很大。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启超回国涉足民初政坛。他加入熊希龄内阁，先后任司法总长、政治顾问，为袁世凯代言。1915年，袁氏复辟帝制，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帝制，被迫南下。年底，护国战争爆发。次年，梁启超赴两广参加反袁斗争。

^{*} 本书综述部分均由沈广斌完成。

1917年，通电反对张勋复辟，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护法运动开始不久，段祺瑞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辞去职务，退出政坛。1918年底到1920年3月，梁启超赴欧游历，亲历了中国外交的失败，目睹了西方社会的危机四伏，感慨万端。在《欧游心影录》中，他宣扬西方文明及科学万能论已经破产，主张发扬东方传统文化以拯救世界。回国后他又积极主张立宪政治与“联省自治”运动。他虽然不能忘情于政治，但已经开始潜心向学，不遗余力地从事讲学和著述，研究范围涉及先秦诸子、清代学术、文学、史学、哲学和佛学。1920年创办讲学社，先后聘请罗素、杜威、杜里舒、泰戈尔4位名哲来华讲演。1922年起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兼课。1923年，他在天津依托南开大学发起创办文化学院。从1921年到1923年，梁启超应邀到北京、长沙、南京等地巡回讲学。1925年，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一起，应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讲授“诸子”、“中国佛学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等课程，培养出了一批国学研究人才。同年，与袁同礼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图书馆协会。1926年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后因病入协和医院。1927年负责编撰了《中国图书大辞典》。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享年56岁。

梁启超作为一代国学大家、著名学者，一生著述等身，总约千万余字，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此处择其要者简介如下：

（一）合集

《饮冰室合集》，此书由梁任公生前好友林志钧编辑，193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40册149卷，1000余万字，基本收入了梁氏所有的已刊论著及部分未刊文稿。该书分文集、专集两个部分，文集共16册45卷，包括文章、诗词题跋、序文、墓志等；专集共24册104卷，收入专著及梁氏弟子所录笔记。是研究梁启超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著作类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梁启超总结中国学术思想得失之作。原拟分16章完成，但仅完成了前六章与第八章。前六章包括：一、总论；二、胚胎时代；三、全盛时代；四、儒学统一时代；五、老

学时代；六、佛学时代，先后发表于1902年3月到12月的《新民丛报》上。第七章（阙）。第八章即“近世之学术（起明亡以迄今日）”，写于1904年，刊于同年9月至12月《新民丛报》第53~55、58号上，署名“中国之新民”，后收入《饮冰室文集》。该书是国内学术界最早的通史形式的中国学术史著作，梳理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提出了反对思想一统而提倡学术自由的主张。

《清代学术概论》，原是作者应邀为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所写的序言，题名为《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发表于1920年11月至1921年1月《改造》第三卷第3~5号。后因篇幅太长修改补充后独立成书，作为“共学社史学丛书”之一，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改为今题。因清代学术史是梁氏所计划写作的《中国学术史》的一部分，故又加一副题“中国学术史第五种”。后来此书多次重印，先后出版了“万有文库”本、“大学丛书”本，并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全书共五万多字，论述了从明末到清末近三百年的学术进程，将清代学术史分成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四个阶段。严格说来，《清代学术概论》既非研究清代学术的首创之作，亦非专门史的著作，但它仍以急就章成为清代学术研究必备的经典名著，值得一读。

《中国历史研究法》，原为作者192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的讲稿，内分“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等六章。先是以《中国文化史纲》为题，在同年11月15日《改造》第四卷第三号上发表了前三章，修改整理后，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47年共印七版，后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该书总结了中国旧史学，阐述史学研究的意义、对象和任务，分析了史料的种类、搜集、鉴别和使用的方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作者1926年9月至1927年5月在清华学校演讲的讲稿，由学生周传儒与姚名达记录整理，其中的“绪言”与“总论”三章题名为《历史研究法》刊于1926年10月至11月的《清华周报》第26卷第1、2、3、5号上。1927年编辑成书，更名为《中国

历史研究法补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本书为《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补充，重点讨论了各种专门史的研究写作方法。分《总论》、《分论》两部。《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尤偏重于各种专史的作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集中体现了梁氏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论，是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代表作，影响很大。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原为1923年至1925年之间梁氏任教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时的讲义，生前未完稿。其中之一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曾发表于1924年6~9月的《东方杂志》上。全书先后于1929年由上海民智书局、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单行本。1932年被收入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专集》。全书共25章，本书前11章分别从引论、总论、心学、经学、哲学、史学、程朱理学、颜李实学、自然科学等方面论述“清学”，以学为中心，以分析为手段；第12至25章是梁启超中国通史、文化史研究的清代部分，大致总结和阐发了17、18、19三个世纪，即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这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中国学术发展，故称之为“近三百年学术”。作为梁氏学术论著的代表作之一，它突破了学案体的学术史著述模式，为学术史撰著作出开创性的贡献，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上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至今仍备受学者和广大读者所推崇。

其他著作还有：《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三）文章类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载《时务报》1896年10月第9册。

《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载《时务报》1898年6月第55册。

《少年中国说》，载《清议报》1900年2月第35册。

《阿旁观者文》，载《清议报》1900年2月第36册。

《新史学》，是梁启超继《中国史叙论》（《清议报》1901年）之后所撰的一篇长文，发表于1902年2~11月的《新民丛报》。后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新史学》全文包括：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共6节，在结构上与《中国史叙论》相似，在思想、内容上前后连贯，多有互补之处。作者

自称“新史氏”批判旧史学；提倡“史界革命”创立“新史学”。两文标志着新史学理论体系的成熟。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载《大中华》1915年8月第1卷第8期。

《翻译文学与佛典》，又名《中国古代之翻译事业》，载《改造》1921年7月第3卷第11号。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新小说》1902年11月第1号。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载《改造》1922年3月第4卷第6、8号。

《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载《晨报副镌》1922年3月13～17日。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载《时事新报·学灯》1923年1月23日。

《人生观与科学》，载《晨报副镌》1923年5月29日。

（四）讲演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载《申报》1920年3月15日。

《情圣杜甫》，载《晨报副镌》1925年5月28～29日。

《屈原研究》，载《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1月9～15日。

二、学术贡献及主要观点

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9卷，1000余万字。其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此处择其要者简介如下：

1. 政治经济思想

梁启超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一生未能忘情于政治。他曾自言“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虽未尝一日立乎人之本朝，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①。可见，政治思想是其学术思想的

^① 《吾今后所以报国者》，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核心，它决定了梁氏学术研究的特色及理路。所以，了解梁氏的学术兴趣必须要先了解其政治思想。

梁氏的政治思想大体上包括爱国、民权、宪政三个部分，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简述一下梁氏的政治思想。一是爱国思想。梁氏以爱国为己任，早年与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办报救国，后来又写下《爱国论》、《爱国歌》，以国家为人民之命根。但他爱国的具体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1895年到1898年维新变法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他发起“公车上书”，筹办报纸，发表《变法通议》，组织学会，目的是通过变法救国；从1899年变法失败到1903年前后，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他与革命派接触并且受到了孙中山思想的影响，由变法救国转向革命救国；从1904年旅欧归来到1919年，是力主宪政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又分成两个时期，从1904年到1911年是前期，主张君主立宪，从1912年到1919年是后期，主张共和立宪；从1920年到1929年是第四阶段，主张教育救国。梁氏的爱国体现出了近代的国家观念及新的时代特点，爱国思想是其一生行为及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

二是民权思想。梁氏运用近代的国家观念、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论证了兴民权的重要性。他认为兴民权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积弱就是因为民权的孱弱。所以，民权是国家兴亡的关键，民权是长期形成的，要兴民权必须要先开启民智，开民智须先开绅智、开官智。在《变法通议》中，他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他重视教育，主张建立“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的新式学校，培养“新民”。避居日本期间，他写下了洋洋十万言的《新民说》，提倡自由权利思想与“新民之道”，他认为提高国民素质是国家盛衰强弱的关键，“新民”是具有德、智、体三种素质而尤其是具有民德的国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成为了当时的第一要务，是挽救国家与民族危机的关捩点。

三是宪政思想。梁氏活跃于政坛三十多年，致力于推行宪政，宪政思想是梁氏政治思想的重点。他认为，在根本上，立宪是为兴民权，也

是为保障民权，立宪必须要以民权为基础；在形式上，宪政分为君主立宪和共和立宪两种，后者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只有君主立宪最合中国的国情，是“政体中最良者也”，宪法是宪政的根本保障，立宪及宪法的制定不能一蹴而就，要按部就班才能完成；在宪政与政党关系上，专制政体下无法产生政党，只能产生朋党，只有在立宪国家中才有政党，而政党不同于朋党，它是立宪政治实行的基础，有了真政党才能实现真立宪。总之，梁氏的宪政思想虽是移植于西方，却能够结合现实，有补于世。

与政治思想密切联系的是其经济思想，梁启超曾经担任过袁世凯政府的制币总裁和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对经济问题也有所研究。他认为，经济即生计，经济问题是立国之本。要拯救中国的经济，必须要将货币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租税政策合一，改正税制，整顿金融，改良国库，做到标本兼治；财政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新民说》中他提出了“生利分利”论。他还分析了旧中国生产落后的根本原因，提出振兴农工商业的主张，认为实业交通是富国之本。他主张财政改革，提出整顿赋税，改革货币制度，建立银行制度。他主张土地私有制，反对土地国有制，认为国有制会减少人的勤勉赴功之心而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他还论述了公债的性质、用途等相关问题，至今仍然有借鉴意义。

2. 哲学思想

梁启超跟随康有为，深受其所接续陆王心学的影响，后来又对佛教产生兴趣，心学与佛学构成了他哲学思想的两大渊源。首先，他认为“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唯心造之境为真实”^①，思想、理论是事实之母。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他坚持唯心论调，但他并未否定物质对思想的制约作用。他作《非“唯”》篇，认为心力是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所在。但他反对在心字头上加个唯字。他认为物对心的制约作用是无法否认的。他在讲到创造时说，人类创造是自由意志和心能发展的结果，但又与环境密切相关，总以他所处的环境为立

① 《自由书·唯心》，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45页。

脚点。他还认为，人类社会是时刻变化的，所遵循的规律便是公羊三世说。梁氏在哲学观上有一定的唯物主义成分，但最终仍然脱不了唯心主义的泥淖。

其次，在认识论上。他宣扬认识的先验性，又强调后天的养成。他说“才之为物，由于天授者半，由于自成者半”^①。“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即言任何人的头脑中都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都具备认识事物的能力。但是这样的天性会受到各种后天的因素的束缚。他认为各式各样的奴隶性是压制人的本性发展的根本原因，要破除这种束缚，就要破除此种奴隶性，通过提倡自由，启发国民的自由心理与思考，实现新民的目标；除此之外，他对后天的因素也非常关注，他重视教育，兴办学校，以开民智富国家。

再次，在伦理观上。他非常重视伦理道德，作《新民说》、《论私德》、《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等著作批判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他认为道德的起源与判断标准是利群；道德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变革旧道德建立新道德；道德有公私之分，独善其身者是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是公德，二者都是人生所不可或缺的。

最后，在方法论上。他重视实证法和归纳法，提倡综合研究法，反对历史研究中的因果律。总体来看，他的思想方法是属于形而上学的，为宣传的需要往往走向极端化，这也是他的缺点所在。

3. 新史学思想

梁启超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学、哲学、史学等领域都有很多的创获，尤其是在史学研究上，贡献更大。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倡导者，他是最早运用资产阶级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之一。从早期的《中国史叙论》（1901）、《新史学》（1902），再到后来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历史统计学》（1922）、《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在这一系列的史学著作中，梁启超批判了旧的史学传统，提出了新史学。

首先，他明确了史学的重要作用，探讨了历史研究的意义，表达了

^① 《罪言·才难》，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

进化论的历史观。他认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心之源泉也”^①。他将欧洲民族主义的发达归因于史学。进而他又在公羊三世说的基础上吸收了达尔文的观点，探讨了历史研究的意义。他认为，历史是“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②。历史是螺旋式的上升，而不是如孟子所说的“一治一乱”的循环。史学的任务就是“叙述进化之观象”。据此，他将中国历史分成上世、中世、近世三个阶段，这种划分打破了以往以朝代划分历史的方法。他还注意到了地理环境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他认为一国或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性格与其地理密切相关：中国版图巨大造成了大一统与封建专制的政治格局；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使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所具有的民族性格各不相同；地理的不同还决定了文明程度的高低及南北学术文化风格的差异；总体看，地理与历史的关系犹如肉体之于精神，有健全的肉体才能有活泼的精神。在英雄人物与历史的关系上，他将英雄人物分作两类：一是先时人物，即“造时势之英雄”；二是应时人物，即“时势所造英雄”。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都有道理，但他尤其肯定了前者，认为前者具有理想、热诚、胆气三种德性。他还认为，二十世纪以后将无英雄，因为教育普及，分工越来越细，所以人人皆是英雄，最终他得出了“文明愈开，则英雄将绝迹于天壤”的结论。^③

其次，他以此历史观为指导，批判了旧史学。他认为，中国是史学出现最早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④。史学发达的原因在于：中国史官的设置很早，史官的职责极为崇高。中国史学具有早期采用诗歌体、为文采用编年体、形式完备、内容无所不包等几大特点。他又将历史著作分成君史、国史、民史三种，认为西方各国民史兴盛，中国旧史“强半皆君史”。《史记》是以社会全体为中枢的国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正史从此变为“一代之主作谱牒”^⑤。在此基础上，

①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1页。

② 同上书，10页。

③ 参见《自由书·文明与英雄比例》，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85页。

④ 《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10页。

⑤ 《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59页。

他对旧史学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批判，归纳出旧史学的“四蔽二病”：第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导致二十四史成为帝王的二十四姓家谱。梁启超批判了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的正统论与修史、纪年方法。第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导致旧史“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最终成为现象的罗列和墓志铭的汇编。第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旧史作于易代鼎革之后，丝毫不涉及当代历史与社会现实，因此毫无现实作用。第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即只有呆板的客观事实的叙述，无法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轨迹。这四种“蔽”又滋生出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编纂方法陈旧；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编纂体例缺乏创新。^① 这些弊病给读者带来三种恶果：史籍浩如烟海，“难读”；不知何为有用，“难别择”；不知启迪爱国心与合群力，“无感触”。

针对以上旧史学的各种弊病，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建立新史学。具言之，他在历史观上，提倡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探索人类社会进化的原因，即历史是“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在史学的内容上，打破“帝王中心论”及“正统论”的桎梏，使史学真正为国民服务，“助成国民性”的发展。在功能定位上，要变以死人为体位的历史为以生人于本位的历史，联系社会为现实服务。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清除主观偏见，做到客观研究，“为历史而治历史”，以历史为目的的不以历史为手段。

治史方法具体又包括史学研究主体即史家的修养、素质和史料的处理两个方面。在史家的修养、素质方面，他认为，史家应具有“四长”：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史德指态度客观，忠于史实；史学要求“贵专精不贵杂博”；史识指善于观察，有敏锐的洞察力；史才指书写历史的才能，要求简洁、生动。在史料的处理方面，他认为，要扩大史料收集的范围，要从“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去寻，“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都可以作为史料，甚至包括早期的神话传说。在史料的辨析上，他推崇培根的实验法与归纳法，笛卡尔的演

^① 参见《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3~10页。